

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

杜运辉^{**}

【摘要】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是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经历六个发展阶段，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学者颇有特色而又紧密配合的理论形态。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有：文化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现代转型；对西方文化的客观分析与取精用宏；正确处理中、西、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准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文化体用论思维方式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等等。习近平同志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西文化采取平等包容、分析批判、取精存真、扬弃创新的态度，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论的旗帜下，总结和评价近百年来文化道路之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和有机融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综合创新；主流学派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是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在悠久深厚的唯物论和辩证思维影响下，中国古代涌现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损益可知”（《论语·为政》）、“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传》）、“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汉书·艺文志》）、“一本而万殊”（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徐光启）等文化观点。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逐渐揭示和阐发了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规律，开创了文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张申府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编号16AZX013）的阶段性成果。

^{**} 杜运辉，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化研究的新模式和文化实践的新道路。

一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以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迫使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①。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封建农耕文化不能有效地“同化”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由此“师敌（夷）之长技以制敌（夷）”（林则徐、魏源）、“彼之所长，我皆有之”（曾国藩）、“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谭嗣同）与洋务派“中体西用”等文化观相继而生，虽逐渐突破经学束缚而走向“中学”与“西学”之会通，但皆在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实践中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制度化儒学失势，主导性意识形态的空白深化了西方文化思潮和尊孔、复古思潮的交织杂糅。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一方面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国情呈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立互动、错综交融的新格局，另一方面也为破解中国文化出路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方克立指出，反映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②三个基本派别，分别代表着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中体西用”式的儒家资本主义三种现代化模式。从思想层面来看，三种模式的核心争端是如何处理中、西、马文化资源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长期的艰难探索和文化论争中，逐渐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它经历了萌蘖初生、奠定雏形、基本成熟、曲折发展、复苏重兴、繁荣深化六个阶段，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学者颇具特色而又紧密配合的理论形态。

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很快就超越了进化论的直线性思维，初步回答了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和中国的现实出路。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开创者，早期在“民彝”“青春”“调和”哲学指导下主张“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③、创造“第三新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探讨新文化的变革方向、根本动力、依靠力量及其“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物心两面和灵肉一致的改造、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等基本特征，“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④，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调，对毛泽东、张申府、张岱年、冯契等都产生深远影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页。

② 《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218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2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83页。

响。陈独秀早期在“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的进行曲中也交织着辩证思维的活泼音符，认为文化“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①，主张尊重正当学术讨论自由、“尊疑尚异”、“自由独到”，对新旧思想兼收并蓄而“综合”“创造”。他后来主张“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社会之新旧变迁终属相续而相错”^②，但未解决文化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等问题。张申府最早运用对勘法（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最早提出设立“文化学”，认为对西方文化既不能“蔑”（“反动地反对”）又不“媚”（“囿囿地维护或颂扬”），对中西文化亦不能“一脚踢”或“一兜包”，复古主义的“保守东方旧化说”、全盘西化式的“移植西洋旧化说”和中体西用式的“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都行不通，只有“顺‘物质’之可能，先就物质的基础，而引之趋于理想。为理想之形成，应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估重、评衡及别择”^③，创建超出中西旧文化的“第三文化”。这可谓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的具体和深化。

李达、张申府等反映了“北伐成功”以来“以马克思体系的辩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潮”^④的时代特征，孙道昇则认为张申府可谓“解析法的新唯物论”^⑤之代表。不仅如此，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更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探讨文化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之雏形。张申府在1932年提出“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⑥，最先从中、西、马三“学”角度标举“三流合一”文化旗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正式诞生。张岱年认为“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才能正当的处理”^⑦，他不仅最早认同“三流合一”，而且把“三流合一”与“创造的综合”相结合。他反对“全盘西化”与“读经复古”，阐明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连续性与变革性、独创性与开放性、整体性与可汲取性等基本矛盾，坚信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初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框架，达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高成就。1937年，毛泽东连续发表《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虽未专门探讨文化问题，却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此外，鲁迅的“博采众家，取其所长、留其精粹，融合新机”文化观和苏渊雷的“文化综合论”，也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趋于成熟，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开放视野，主张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接受

- ①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3页。
- ②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75页、第280页。
- ③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192页。
- ④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1936，第196页。
- ⑤ 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45期。
- ⑥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614页。
- ⑦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47页。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他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①等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经典表达。张申府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认为以孔子、罗素、列宁为代表的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之间并非敌对冲突而是相补相充，只有辩证地综合“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和“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才能够创立“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②。张岱年完成“天人五论”和《文化通论》，提出以“文化系统论”“文化变迁论”“文化类型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哲学元理论，并为综合创新文化观奠定了“兼和”哲学基础。与毛泽东、艾思奇等以“斗争性”与“同一性”相对应不同^③，张岱年认为“冲突”（“乖违”）与“和谐”相对应，“和谐”即“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或“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结聚而相成相济”^④，包含“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和“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四种情形。这就意味着“对立”和“冲突”的解决方式不仅仅有相互转化、一方消灭另一方和同归于尽，而且还有着“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⑤这种多样性统一之可能，这在文化研究上无疑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阐述了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开放性、创造性等原则，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⑥著名命题。他主张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主张“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促进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⑦。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未能完全落实，而“左”倾错误不断强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都不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对西方文化的封闭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化，导致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出现曲折乃至沉寂的暂时低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逐渐从复苏走向繁荣。张岱年在1979年提出区别精华与糟粕就是批判继承的主

-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00页。徐特立曾形象地论述“古今中外法”：“因此我们要用辩证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123页）
- ②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143~144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32页。《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90页。
- ④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778页。
- ⑤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825页。
-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致陆定一》，人民出版社，1984，第598页。
-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2~83页。

要方法和基本原则，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①。他严肃批判新时期的“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道路；论证文化系统的可分性和文化要素（文化元素）的可选择性和重构性，着重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核心层面探索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之比较与会通。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日益得到学界特别是“曾亲自受教于张岱年并高度认同其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批学者刘鄂培、袁尔钜、方克立、程宜山、王东、刘仲林、李存山等为代表的第二代”^②的深入阐发和翔实论证。刘鄂培提出“兼和”是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精髓；方克立在1990年提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为‘综合创新’派）”^③是五四以来的三个最主要思想派别，这不仅第一次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而且第一次把张岱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与我们党的文化方针融为一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完整图景和历史地位，可谓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发展的里程碑。方克立在2006年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④，通过明辨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从而把张岱年文化体用思想发展为“魂、体、用”三元模式，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新境界。此外，李锦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张岂之“兼和守正创新”、程恩富“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孙熙国“以时代实践为本，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外来文化为具”等观点，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表达方式。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逐渐成为我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稳健前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更加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与学界紧密互动的新态势，习近平同志对中、西、马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对意识形态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做的重要论断，指明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

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做出了多方面

① 《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53~254页。

② 杜运辉《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215页。

③ 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④ 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55页。

的理论探索。

（一）文化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毛泽东于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阐述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逐渐形成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政治力量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揭示了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演变的深层动因。《实践论》提出从人的历史发展、从生产活动等实践活动中去观察认识问题。《矛盾论》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这些论断，对于研究文化的发展与本质、多样性与主导性、常住性与变动性、连续性与阶段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可分性与整体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时，毛泽东强调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②，批判地而不是盲目接收或盲目抵制民族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

张申府认为，对中西文化要“抑制那分英雄态度，不轻于抹杀一切”，“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态度”，对“真可称是‘方法的方法’的客观实在的辩证法，我们必尽可能地与以极大的重视、尽量的推阐”^③。他区别“混合的综”与“化合的综”，“外表之综”与“内里之综”，认为中、西、马皆有其“分”“所”“当”而须融合会通。张岱年认为“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④，中西文化并无根本不同而只有偏重之异；文化是具有可汲取性的整体与要素相统一的复杂结构，一切文化内部都有其内在矛盾，因而对中西文化都应持“分别观”和“批评的态度”，注意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对立与西方文化中的分裂。他反对全盘承受西洋文化和恢复旧文化，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⑤。张申府、张岱年的有关论断与毛泽东的表述高度一致，都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问题的卓越代表。相比较而言，“二张”先生更注重文化的连续性与变革性之统一，强调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2页、第320页、第3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2页。

③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92页、第292页、第556页。

④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409页。

⑤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372页。

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旧系统结构的解构和新形态结构的重构之统一。

《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好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①，“最彻底的决裂”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人类历史上的传统观念，“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实践中认识到，旧文化旧观念的某些形式也应加以扬弃，如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恰当结合，鲁迅认为对中国文艺旧形式的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③。因而完整说来，对一种旧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应该加以辩证分析和批判继承。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批评西化论者、现代新儒家和叶青等伪马克思主义者以各种方式曲解、抹杀马克思主义的“不求甚解，不作同情的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的“盲目反对的态度”^④。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主张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主张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而应“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⑥；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信仰到极笃的时候，便多少有点宗教性”^⑦，但不赞成以妄想、迷信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⑧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或公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⑨；他主张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发动一场“启蒙运动”，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人民的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6页。

③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4页、第25页。

④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2页。

⑥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84页。

⑦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5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3页、第814页。

需要为基础来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它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而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张岱年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批评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和“彻底批判、彻底诘问”的“爱智”之诚“吾人对任何学说皆应保持批评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奚独不然?盲信与盲诽,皆背乎批评者也。”^②他否定当时某些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墨守的态度”和“修正的态度”,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实践观、唯物辩证法等确有胜过它派哲学之处,也要看到当时流行的“新唯物论”有着“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的彩色”^③、“蕴谊极丰而论证或有时简而不晰,故颇易引起误会”^④等弊端,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已有理论应“更加阐发”,对其未及讨论的问题则应“发挥扩充”或“补充研讨”。20世纪下半叶,冯契亦主张“对各派哲学都应持这种独立思考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如此”^⑤。这些观点都批评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准确把握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的精神实质。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⑦今天,我们既要论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也要吸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左”倾偏向的历史教训,警惕把马克思主义过度学科化的新关门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大成果,张申府、张岱年、冯契等学者也做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探索。张申府主张“使辩证唯物论精审圆成”^⑧,把它看成“方法态度”“元学”“知识论”“人生观”所组成的有机系统,其“大客观主义”和“具体相对论”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他把共产主义、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称为“天人谐和”,也就是“个人主义”与“大同主义”(或“共通主义”)之圆满统一,这与李大钊“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⑨恰为共鸣。张岱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创新性,反对把它实证化、科学化;主张以解析法将新唯物论的根本观念剖辨清楚,以唯物辩证法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推阐其所未明言之义,以辩证唯物论为原则吸收他派哲学中之合理成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传统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②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15页。

③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173页。

④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09页。

⑤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1页。

⑧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51页。

⑨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83页。

学，并寻求、继承、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唯物思想精华。冯契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探讨“古今中西”文化问题，主张“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学习西方哲学的长处，发掘和提升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智慧”^①，其“智慧说”三篇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生动实践。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现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充分尊重、客观认识，又要批判继承和创造转化。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②。中国共产党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同时也要辩证地分析民族文化中的腐朽文化与人民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③，继承其中的珍贵品并“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④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唯物唯心二分法、理论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而以阶级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凸显了学术研究的政治标准，但没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内在机理。

鲁迅认为“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⑤，对中国旧文艺要“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⑥。张申府主张超越“五四”的激烈偏向而对孔子“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⑦，强调“中国自己作得主宰”^⑧的民族主体性。张岱年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拔夺”，对“有害的文化赘瘤”或“病态的腐蚀的部分”必须“克除之，破坏之，扫荡之”，对“有永久性的文化遗产”或“健康的活的部分”要“不惟应保持之，而且应发展之，提高之，扩充之”^⑨。了解传统才有可能超越传统，“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我们所需要的

① 陈卫平等整理《冯契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0页、第4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第70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1页。

⑤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1页。

⑥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4页。

⑦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751~752页。

⑧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91页。

⑨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403页。

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①。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学既有维护等级区分的“浅层思想”，也有高扬精神生活的价值、增进民族凝聚力等“深层意蕴”。既要运用阶级分析法揭示儒学的阶级性、等级性，防止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解读和过度诠释，反对罔顾历史事实和基本国情的“儒学复兴论”；又不能把儒学与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简单画等号，要反对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儒学否定论”。正确的态度是把儒学中具有“相对的恒久价值”与“相对的普遍意义”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成分。

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始终强调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联接、扬弃、继承和创新，这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②

（四）对西方文化的客观分析与取精用宏

毛泽东反对盲目自大的保守主义、排外主义，主张既要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也要反对生吞活剥或留声机式的“全盘西化”，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西方文化、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来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进步因素，“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③。他本人就对欧洲哲学有广泛涉猎，“他并不只读马克思派哲学家的书，而且读些古希腊的东西，至于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的著作，当然也是读的，并且遍读其他最先进著作”^④。他认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⑤，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才能真正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的区分不是很清晰，这就会影响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判断和择取。

张申府既主张全面、系统地理解西方文化，又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文明之极境，批评“甘于为奴”的媚外作风和“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⑥的教条主义。张岱年认为中西方文化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具有两重性和可汲取性。他坚决反对“完全排弃旧有的，不思根据有益的文化遗产作进一步的发展，纯以全盘抄袭为方法以图创造”的“全盘西化”论，汲取西方文化要注意分析西方文化本身之分裂与对立，而且“应从量的注意转到质的注意。我们不要求量的全，我们要求质的深”“我们

①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43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3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

④ A. 斯诺《毛泽东印象记》，《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44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2页。

⑥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76页、第381页。

不要全盘西化，我们要有选择而深入的西化”^①，自觉选择我们所最缺乏的西方文化的最珍贵贡献并彻底、深切地追求之。同样地，鲁迅主张对外来文化要有开放性和选择性，反对盲目的“闭关主义”、奴才的“送去主义”和被动的“送来主义”；不仅要运用“拿来主义”，而且“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②。

总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既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对话的开阔胸襟，又警惕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辩证分析、批判继承和中国化的正确态度。

（五）正确处理中、西、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

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核心问题是恰当处理中、西、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准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

毛泽东反对以“中国的特殊国情”来排斥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中国具体国情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创造了一种中国形式和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③。毛泽东认为，对儒家文化“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④；要高扬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⑤，只有“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才能“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文化而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毛泽东解决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

张申府“百提，伊里奇，仲尼，三流合一”和“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平列表述，虽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但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主张“中国自己作得主宰”^⑧“要已经相习而不自觉地时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把它贯通到各角落各方面”^⑨，而且认为“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⑩，非常关注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精华之会通。

张岱年更明确地阐述了中、西、马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以唯物论为基

①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404页、第415页、第416页。

② 《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38页。

③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91页、第19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6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2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3页。

⑧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91页。

⑨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149页。

⑩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339页。

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①,克服了“百提,伊里奇,仲尼”未能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表述弱点。他认为“文化的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的综合”^③必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一贯大原则”或“新统”。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他先后提出“并列”或“并重”、“结合”、“主导思想—支流思想”与体用关系四种模式。健全发展的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它规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向;同时,又要容许多种学术流派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与发展。“多”中有“一”,“一”“多”相容,有同有异,同而且异,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多样性统一的“兼和”状态,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由于有这种‘兼和’(‘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胸襟、态度作为其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基础,走出一条中、西、马综合创新的哲学‘新路’才成为可能”^④。以“兼和”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尊重差异、包容多种思想学说的宽阔胸襟。

(六) 文化体用论思维方式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文化问题,必须直面有着悠久传统的体用范畴。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影响甚大,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冯契都很重视文化体用问题,都有过一些重要论述;陈旭麓、丁伟志、杨承训、程恩富、孙熙国等人的研究和讨论,亦属此列;形式上与“中体西用”相对的“西体中用”也曾引起热烈探讨。文化体用问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须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时代提出的紧迫理论任务。其中,张岱年和方克立做出了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

张岱年特别强调体用关系是探讨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提出“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和“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⑤两种代表性观点,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想学说之间是一元主导与兼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关系。“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等论断,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涵盖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和科学技术之“用”的实质内涵,这种形式(二元)与内容(三元)的张力预示着理论

①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422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26页。

③ 《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451~452页。

④ 方克立《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

⑤ 《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29页。

思维的重大飞跃。

方克立科学地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贡献，特别指出张岱年的典型表述中存在实体与作用、原则与应用两种体用关系，主张把中、西、马都放在“学”的层面来界定其地位及相互关系。他以“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模式界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等新概念，确立和强化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以“魂”和“体”分别指称指导地位的主导性之“体”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从而由传统“体用”二元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新模式，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中国传统体用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最显著特质，就是新的历史形势下体现了主导性（方向性）、主体性与开放性三者的高度统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它强调汲取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挺立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对于当今各国处理一元主导、民族主体与兼容多元的复杂关系有着一般性的启示意义。“马魂、中体、西用”论精辟而准确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发展道路、演变规律和未来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正面回应“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的理论表达。

三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的现实意义

从20世纪上半叶李大钊的“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张申府和张岱年的“三流合一，综合创造”论和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到20世纪80~90年代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再到21世纪初期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清晰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演进的基本轨迹。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文化理论、文化方针和文化实践，鲜明地体现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基本思路。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表明，以李大钊、毛泽东、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张申府、张岱年、冯契、方克立、程恩富、孙熙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做出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准的回答，代表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①。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文化主张，最终都要落实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上，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就坚信中国文化的前途只能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

^① 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6页。

“带着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②，而不可能是读经复古、全盘西化或调和持中。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做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综合创新之路才有中华文明的光辉前途。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是紧密关注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并加入时代思潮，努力探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途和出路。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等都参加了“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而“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更直接刺激了张申府、张岱年在“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之外另辟新路。张申府反对胡适的“放任说”或“全盘承受说”，强调“不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或建设中国的新哲学，如要有成，都不能不利用这个于古已有了点的辩证唯物论”^③。他还在1937年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④，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机械之偏差。张岱年则对文化的界定、文化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文化的性质、中西文化的异同、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基本环节和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并在与梁漱溟、冯友兰、沈昌晔、胡适、叶青、柳湜等的互动讨论中，初步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又不同于某些“今之言新唯物者”文化观的新蓝图，成功地把“中国本位文化”论转变为“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的“文化的创造主义”^⑤。毛泽东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研究“近百年的文化史”，总结五四运动“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功绩和“形式主义的方法”的缺点，批评留学生“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而“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⑥，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⑦。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总结了近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回应哲学、文化学、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思想论争。方克立、李锦全发起“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这一课题研究本身就是直接参与文化讨论……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等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联合广大学界，发起《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直接面向当代文化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的最新举措。

①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第375页、第421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3页。

③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275页。

④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614页。

⑤ 杜运辉编《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372页、第375页、第37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

⑧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自序第4页。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中、西、马的对立互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和学界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①，“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他认为“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③，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他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④，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些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准确而圆熟的运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对待外国文化的开放性，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西文化采取平等包容、分析批判、取精存真、扬弃创新的态度，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道路，也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久久可大、永续发展之路。

The Mainstream School of Marxist Cultural Study in China

Du Yunhui

Abstract: The Marxist comprehensive-innovation cultural school is the mainstream school of Marxist cultural study in China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1920s, the Marxist comprehensive-innovation cultural school has evolved through six main stages, presenting a theoretical idiosyncrasy with specific identity and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Marxist scholars. The basic perspectives of this school are as follows: (1) when studying the cultural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must be adhered to; (2)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sisting on Marxism and developing Marxism be brought about; (3) the critically inheritance and modern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6页。

②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第11页。

③ 习近平 《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第10页。

④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8页。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e carried forward; (4) the objective analysis and absorbing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be actualized; (5) the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western culture and Marxism be properly handled; (6) and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tal innov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on the “subject-usage” such as the theory of “Marxism as spirit , Chinese learning as subject , western learning as usage” be pushed forward.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attitude of equal and tolerant ,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 successive and innovative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 which points ou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oday , we should more consciously sum up and evaluat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truggle over the cultural roa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Marxist comprehensive-innovative cultural theory , in particular , promoting the deep dialogue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m; Cultural Study; Comprehensive-innovative; Mainstream School